

些方面的濫用會遮蔽中古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和複雜性。像仇著這樣既重視對魏晉之際的人事關係、政治事件進行大量實證研究，又在此基礎上對政治集團分析理論加以深入反思，無疑是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一條新出路。

王晶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86頁。

陰陽災異、星占氣象，對當代的普通人而言，多屬無稽鬼魅的迷信之談。甚而至於，大部分史學研究者在讀到有關讖緯術數、形法堪輿的文字時，亦難解其理，或只能視而不見，或謂其穿鑿附會。孫英剛的新著《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獨闢蹊徑，放下了今人面對古代知識時的傲慢態度，從古人的視角出發，透過細緻的史實考證，為我們揭漿讖緯、術數知識的內在邏輯，展示它們在中古政治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全書正文共分為四個部份。緒論、上篇「天命與預言」、中篇「祥瑞與災異」、下篇「曆數與曆術」。緒論五個小節的標題——「神文與人文」、「天命與天道」、「預言與災祥」、「曆術與曆數」、「烏托邦與救世主」，實為五組關鍵字，提示了本書的要義。

「神文與人文」，可以說是本書的解題。作者認為，對政治合法性的論證，大體可分為神文與人文兩種路徑。神文，即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天或神；而人文，主張政治的合法性來自人本身。本書研究的中古時期，即從漢至隋唐，位居政府思想資源核心的儒學，大量採用讖緯、術數作為天人感應的論證工具，實際未脫神文主義的總體構架，故本書以「神文時代」總括此時期的政治特徵。

神文時代的統治合法性又以何種形式表述呢？第二節的標題「天命與天道」便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神文時代，統治合法性的最有力論證是得天命，即統治得到上天的認可。得天命者，必須理解自然的運行規律，亦即天道，應向大眾證明自己的行為與天道一致。在政治實踐中，基於實力競逐取得的權力，仍需使民眾相信權力與天命之間確實存在着關聯。

「預言與災祥」、「曆數與曆術」、「烏托邦與救世主」，緒論的後三

個小節，便提示了權力在大眾面前塑造天人關聯時最常用的三種手段。得天命者天人交相感應，故自然現象常被注入政治意涵，解讀為祥瑞或是災異，形成評判當下、暗示未來的政治預言，歷代政權均重視對災祥解釋權的壟斷。曆術是另一論證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通過曆法的頒立、紀年方法的確定，當權者對時間進行定位，由此來解釋自己在時間長河中擔當的角色及肩負的使命。上天對當權者的這一安排，便是曆數。政治世界充滿起伏，政治力量的興替，同樣需要天命的論證。新興力量合法性的論證，還可以通過證明舊勢力的終結來達成，這便是「終末論」。這一邏輯為新興力量對抗舊勢力，形成「造反有理」的輿論氛圍提供了有效的理論工具。

當然，緒論部份理論化的探討，均以主體部份的實證為本。上篇「天命與預言」涵納了四段初唐故事。第一章對唐初僧人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所云「洛州無影，與餘不同」作了新的闡釋。身為佛教徒的義淨，理應主張天竺為宇宙中心，但他在呈獻武則天的書中認為「洛州無影」，即洛陽為天下中心。義淨的這一舉動，實為藉此取得武則天對佛教的大力支持。同時，武則天也利用義淨帶來的佛教知識，為其遷都長安以東的洛陽，應合「江東有天子氣」的政治預言張本。第二章專門對「江東有天子氣」等暗示天子出於東南的讖語作了考察。南朝的政權曾利用這一點宣傳其相對北朝的正統性；隋初大興城（長安城）的規劃為此特意魘鎮東南、以殺王氣；武則天也借此論證其遷都洛陽的合理性。第三章研究了貞觀年間涼州瑞石銘文中的「太平天子」世系。作者指出，此中的「太平」特指聖王時代的「太平」之世，含有復興的意味。該政治理想最初由儒家發明，後被道教吸收，成為道教天地終結而致太平思想的核心部份。唐朝李氏利用儒家和道教對「太平」的解釋，製造了刻有李氏太平天子世系的瑞石出現於人間的祥瑞，以此告知世人李唐皇室確為引領大眾「致太平」的神聖王統。與「李氏當興」相對，魏晉隋唐時期還長久流傳着「劉氏當王」的金刀之讖。第四章梳理了金刀之讖的演變譜系，「劉氏當王」、「李氏當興」均與道教的天地終結而致太平思想密切相關，被寄予救世主的厚望。李唐王朝建立後，道教和「李氏當興」自然為官方認可，而「劉氏當王」被視為政治敵手並失去道教的支持，只能轉入地下而與來自佛教、同樣具有救世主性質的彌勒信仰相結合。武則天上臺之時，為壓制李唐勢力，又曾借用彌勒信仰，以證明自己的救世主身份。可見，儒家、讖緯、佛教和道教各有政治合法性的論證邏輯，政治集團常根據自身需要，擇採某種信仰為其張勢。這一造勢，是面向大眾，故又不能停留於政治精英的自語，須以民眾的認知水準為支撐，精英與大眾兩

種文化亦因之滲透互動。

既然多種信仰均有被政治力量利用的可能，那麼，政權如何對此作出選擇呢？中篇「祥瑞與災異」便是對這一問題的解答，該篇同樣收錄了四段歷史。第一章採用內外史結合的手法，對隋唐之際的宮廷音樂作了研究。歷經魏晉南北朝的文化交融，隋唐時的宮廷雅樂已是胡漢多元來源音樂的雜糅，從隋初「開皇樂議」至唐初祖孝孫、張文收修訂樂律，政權努力協調多來源音樂的旋律配器及其政治象徵，終將不同音階納入一個理論體系。自然現象的解讀關乎政治輿論的走向，在不同權力集團眼中，同一自然現象便會呈現出不同的解讀方式，第二章以五色大鳥為例，考察了這一現象。同樣的鳥情，於己為祥瑞，是鳳凰；於敵則成災異，是羽孽。在史書修撰中，更是可根據後世的實際政治走向，回溯對應。政治集團選擇於己有利的解釋，導致了不同信仰間的競爭，第三章以武則天時期對晉州地震、明堂大火的解釋為例，對此作了論述。本土陰陽說中，地震為災異，而佛教能將其轉釋為祥瑞，武則天因此果斷選擇了佛教。明堂大火，政治象徵意味極濃，佛教雖能將其瑞化，但終因牽強而難平眾議，武則天為此又不得不部份放棄佛教信仰，向陰陽五行傳統復歸。第四章是信仰競爭的又一例證。陰陽五行框架在為武則天祥瑞化地解釋地震山湧的同時，存在着難以迴避以下犯上的邏輯困境，而佛教的解釋成功化解了這一兩難。四個故事中，權力根據自身需要靈活地選擇信仰體系，各信仰體系也在競爭中柔軟地融匯其他信仰知識，提升自己的解釋能力。

如果說在中篇，權力還是被動地選擇不同信仰給出的解釋，那麼，下篇「曆數與曆術」展示了權力更為主動地利用術數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此篇第一章巧妙地利用流傳日本的文獻，總述了「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的政治涵義，在國內傳世文獻中，這方面的內容反倒語焉不詳。第二章從「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的術數觀念出發，對唐高宗龍朔改革的目的作了新的解釋。這場始於辛酉年的改革並非前人理解的受武則天幕後操縱，而是高宗憚於隋朝滅亡的警訊，依據術數相時推出的政治革新。第三章重點考察了唐肅宗時期出現的無年號與改正朔現象，這些現象應置於安史之亂後，肅宗將玄宗時期的政治遺產全部拋棄的父子隔閡背景下加以理解。

緒論中梳理的信仰與政治間的錯綜關聯，在三組專題研究中得到了扎實的論證。討論主線之外，綿密的考證中還有諸多史實考訂和理解上的發明：如對武周明堂中「鸞鶯」置於九龍之上的解讀；唐初「燕樂」與「讌樂」各自涵義的廓清等。

本書實證部份由多個專題研究組成，每章原為單篇論文，所以在輯合為一書後，部分內容有前後重複之嫌。全書上中下三篇，是依主題而分，篇內各章，在邏輯上大體平行，所以筆者以為，篇內不妨按主要史實早晚編排各章順序。現上篇第一章論述武周史事、第三章討論貞觀瑞石，中篇第三章論及武周後期、第四章主述武周前期，令人閱讀時稍有彆扭之感。

作者放下「科學」的有色眼鏡，赤手空拳進入中古世界，在被今人視為「迷信」的譏諷、術數中，摸索到古人理解世界的思維邏輯。這也是本書超越其論題本身，在方法論上所具有的示範意義。

鄒怡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朱鴻林，《致君與化俗：明代經筵鄉約研究文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261頁。

朱鴻林著《致君與化俗：明代經筵鄉約研究文選》為香港「三聯人文書系」之一種。朱先生的專研領域為中國近世歷史與文化，尤重明代思想、社會與政治史。本書所收錄的即是他研究明代經筵與鄉約制度的四篇專論。書題「致君與化俗」源自杜甫的名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用以指分別行於朝野的經筵和鄉約兩項制度，蘊含着讀書人改良帝王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理想。

明代的經筵制度及其實際運行情況，能非常具體地反映出皇帝的教育活動與價值塑造過程、儒學在皇帝和高級文官間的講論以及高層政治的具體運作等諸方面的情形，但相關的學術研究幾乎仍處於空白狀態。本書作者主要利用《明實錄》與明人文集等材料，重構出具體的經筵講讀活動，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文化面相。本書收錄的兩篇專論分別考查明世宗與其講官的互動以及明神宗朝申時行的經筵講章。關於鄉約的研究，則由於與近代鄉村社會變化關係密切而發端較早。楊開道發表於1931年的《鄉約制度的研究》（北京：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民國二十年〔1931〕）從地方自治角度立論，簡要分析了北宋以降若干鄉約的內容與特點。酒井忠夫與蕭公權分別從民眾教化與鄉村控制出發，嘗試就鄉約的性質與用途提煉出概括性的觀點，影響深